

□凌承纬

日前清理旧时资料，翻出一张老照片，勾起我对30多年前往事的回忆以及对叶毓山先生的深切怀念。

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内容是叶先生正聚精会神做歌乐山烈士群雕稿子的情景。

记得那是1983年春节，大年初三，叶先生一早来到我家，带我去看他为歌乐山烈士群雕做的大稿。此前，我曾与时任市文联党组书记王觉先生两次去四川美院看他为这件雕塑做的不同尺寸的小稿。这次要看的大稿是群雕最后的定稿。那天王觉有事去不了，就我随叶先生去。

大稿是在离主城区几十里以外长江边一家船厂的空置厂房里做的。叶先生对我说，是他的一个学生帮他联系船厂借到了这间闲置的厂房。这里离学校远，清静，没有干扰，可以安心创作。近几个月来，他有一有空就会来这里做稿子，节假日更是如此。

那天去船厂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我们去船厂的是四川美院的一辆老式吉普车，当车行驶到长江边一个叫青草坝的地方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驾驶员揭开舱盖，一大股青烟冒了出来，原来是水箱没水了，发动机过热导致熄火。驾驶员姓周，小年轻，没有经验，提着铁桶去长江边灌了一桶江水，回来直接倒进水箱中。只听见“嘭”的一声响，几乎烧红的发动机遇到冰冷的江水，汽缸一下就炸了！

这下麻烦了。前不着村后不接店，又是春节期间，数公里长的江边一个人影都没有。叶先生跟我商量了一下，决定让驾驶员去找电话，让修车厂派人把车拉回去，我俩步行前往。于是，顶着刺骨的江风，我俩沿长江边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到达船厂。

叶先生打开空置厂房的大门，一块巨大本色湿布遮盖着的雕塑伫立在厂房中间，连同底座有两米多高。他小心翼翼地掀开湿布，一座完整的泥塑群雕呈现在我眼前：群雕

歌乐山烈士群雕背后的故事



1983年春节，叶毓山在做歌乐山烈士群雕泥塑稿。
凌承纬 摄

中的人物塑像有9个，分为前后左右四组，每组人物数量不等，高低错落有致，前后穿插有序，构成形式简洁而连贯。群雕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情绪呼应，人物造型结实丰满，刚柔相济，面部情绪的把控准确、清晰。

从几乎无可挑剔的艺术创造中，可见艺术家独特的心智、丰满的才情，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心血。

叶先生对我说，这座大稿已基本完成，只待翻模，浇铸小样，然后切割分解成若干个小部件，运送到歌乐山下安置

烈士群雕的地方，由石刻工人按比例放大、雕刻成若干个花岗石材质的部件，然后拼装组合成最后的群雕。

叶先生说着又提起一吧喷水壶给泥塑中的几个人物头部喷了些水，用雕塑刀仔细收拾了一下人物面部的细节。然后，他让我帮他拍几张照片，包括群雕的整体、局部，以及他做雕塑工作时的情景。他说一家杂志要用。

给他拍工作照时，我见他穿一件深色中山服，建议他跟我调换一下衣服。我当时穿了一件新买的咖啡色皮夹克，颇时尚，夹克颜色与泥塑颜色也很协调。他笑了笑说：“那倒是可以换一下哈！”于是便穿上我的皮夹克，拿起雕塑刀认真地做起泥塑来。我选了不同的角度拍了几张照片。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颇为满意，选了两张寄给杂志社发表了。

几个月后，歌乐山烈士群雕放大工作全面展开。一天，叶先生打来电话让我去看看。我来到施工现场，见宽阔的工地上堆满了巨大的红色石块，石工敲打、切割石头的声音响成一片，灰雾弥漫却甚是热闹。听见我的喊声，他从一堆石头中走出来，头发上、脸上、肩上全是红色的石头粉末。他冲我笑了笑说：“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我问他：“放大工作你也要亲自做呀？”他说，虽然有两个学过雕塑的青年帮他做人物头像放大工作，但头像细部，特别是表现人物精神和情绪的面部细节还是得由他亲自操刀才行。我问他这些红色的花岗石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他跑了许多地方最后在川西大渡河边发现的。这种花岗岩石，质地坚硬、紧密，不容易风化；红色，具有纪念革命先烈的含义！

1986年，叶毓山先生与江碧波女士创作的歌乐山烈士群雕历时5年终于完成。整座雕塑高11米，由438块花岗岩石砌成，群雕的主题是“浩气长存”。四个面的内涵主旨分别是：“宁死不屈”“前仆后继”“坐穿牢底”“迎接曙光”。自此，每年11月27日前后，来自重庆市乃至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聚集到烈士陵园，瞻仰雕像，祭奠为共和国的建立和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这座巨大的红色雕塑成为永驻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

歌乐山烈士群雕1987年获“全国首届城市雕塑最佳作品奖”，2010年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中国革命美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雕塑作品。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叶毓山一生创作甚丰。其中尤以表现革命题材的大型户外群雕作品影响深远并载入史册。如：“中国工农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纪念碑”“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彝海结盟纪念碑”“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等。这些雕塑遍及祖国各地，成为各地具有地标意义的红色艺术。1962年他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的汉白玉雕塑“毛泽东主席立像”和1977年他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的汉白玉雕塑“毛主席像”更是成为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不朽的杰作。

叶先生以他穷尽心智和情感的创作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普遍尊重和热爱。我永远记得2010年10月，四川美术学院建校70年庆祝大会上，当时的院长罗中立请老院长叶毓山上主席台时，宽阔的川美运动场上数千师生爆发出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也永远记得，一袭白色素衣，长发飘飘，75岁的叶毓山登上主席台转身回望在场师生时，闪动在他眼中的泪光！

2017年1月7日，叶毓山先生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82岁。

一年一度，到歌乐山烈士陵园祭奠先烈的日子又到了。撰写此文，是想告诉人们，关于这座著名雕塑的一些故事，知道并记住创作这座雕塑的艺术家——叶毓山先生。

插图，总算了了伯父的心愿。

伯父生性乐观，所以身体健硕，90岁高龄时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豪情不减当年。他家住在无电梯的九楼，他上下楼梯、上街散步来去自如。2008年8月，伯父的儿孙们为他庆祝90大寿（虚岁90），我代表年事已高无法前去的父母及脱不了身的兄弟，专程赶到垫江为他祝寿。谁知这竟是我与伯父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4年秋，听说伯父在家中跌了一跤造成股骨断裂，从此便卧床不起，后又因发生感染被送入当地医院抢救。尽管当时伯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但我仍万分盼望他能挺过这一关，争取长命百岁。当年12月2日，伯父还是离开了我们。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决定第二天赶赴垫江参加悼念仪式。我父亲因已90高龄无法亲自去垫江为大哥送行，立即写了一篇上千字的祭文，托我一同带去。

追悼会上，我含着热泪代父亲宣读了这篇祭文。看着伯父的遗容，我想起与他生前的交往，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让我无法忘怀。

伯父虽然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永远无比高大。他90岁时曾自撰楹联一副：磨难千般渣滓洞，挺拔万态红岩松。

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人生总结，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我的伯父傅伯雍

石桥铺小学就读。听说当年的渣滓洞集中营就在该区的歌乐山，我便产生了想亲眼去看一下的想法，谁知这机会真的就来到了。

记不清是1963年还是1964年，在临近纪念“11·27”大屠杀的日子，我们小学全体高年级学生带着干粮，于凌晨四点钟左右在学校集合，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数百人沿着公路步行，冒着初冬的寒风和大雾，浩浩荡荡地向二三十里外的歌乐山下进发。

一路上，我无比激动、兴奋。到了歌乐山下天早已大亮，大家在路边匆匆吃了干粮，又继续向白公馆、渣滓洞两处集中营旧址前行。在渣滓洞监狱，当我亲眼目睹了伯父与先烈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既为先烈们崇高的精神所感动，又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革命的老辈而自豪。于是，我忍不住悄悄告诉身旁一位同学：“我的伯伯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他听了之后顿时睁大双眼，脸上充满了惊奇、羡慕的神情。

1981年，受红岩革命纪念馆之邀，伯父参加收集、整理革命烈士的资料工作。

作为一名“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伯父感到有责任将当年狱中斗争的历史写出来，以告慰先烈，教育后人。经过认真查阅、收集、核实资料及采访其他脱险志士，再加上本人亲身经历，他与伯妈历时一年多，共同撰写出了16万字的回忆录——《狱中斗争纪实》，于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多次邀请他去中小学作报告。伯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为弘扬革命精神四处奔波。

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伯父专程来到我家，带来他与伯妈合著的《狱中斗争纪实》，问我能否为其配上插图，将来如果有再版机会时可以用上。当时我虽已发表、出版了不少连环画，但大多是古代题材，对现代、革命题材的绘画风格不太熟悉，本想放弃此次创作。但一想到伯父的期待，就感到自己作为他的亲属及一名绘画作者，有责任将这段历史用画面呈现出来。

于是我于1999年根据此书的部分章节创作了六幅插图，但我对这次创作不甚满意。2019年4月，我又在这六幅旧作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后重新绘制了四幅

唤起儿时甜蜜记忆的重庆糖画

一个多月后，刘贵兵出师，开始了摆摊表演糖画的生涯。

上世纪80年代，普通的糖画一角钱一个。重庆糖画艺人们靠着这小本生意尝到了甜头。在那个春潮涌动的年代，刘贵兵时常出没在菊展、灯会等大型活动。摆一天摊，可以卖几百个糖画，赚几十块钱。那时，猪肉才一块二一斤，刘贵兵的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了。市民要什么，刘贵兵便能不假思索地画出什么，就是在那个年代锻炼出来的。

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做糖画的艺人逐渐增多，刘贵兵转行做了几年厨师，暂时结束了一根担子“走江湖”的生涯。厨师长见他会糖画，便安排他在盘子上画糖画。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有了糖画点缀，让食客更有食欲了。也是从做厨师开始，刘贵兵发现，糖画不光是一门挣钱的手艺，它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成为一种乐观生活的助推剂。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舀起糖浆，或提、或顿、或放、或收，有节奏地浇在钢板上……十来秒钟的功夫，手艺人就画出一个椭圆形的背壳。紧接着，他把腹部、两只钳、八只脚依次画在钢板上，用糖浆把这些部件粘结起来，一只耀武扬威的螃蟹便站立起来。整个过程，他眼疾手快、一气呵成，以腕力带动勾子运行，如行云流水，看得人目瞪口呆。

这位手艺人今年55岁，认识他的朋友都习惯称他“刘糖人”。“刘糖人”名叫刘贵兵，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糖画代表性传承人。他以勾子为笔，以糖为墨，画了41年糖画，画得越来越出神入化。

糖画，顾名思义，亦糖亦画，可观可食。它有500多年的历史，曾广泛流行在巴渝大地的大街小巷。说起它，不少人心中会涌起一阵甜蜜的回忆。曾几何时，在灯会、在集市、在游乐园，年幼的我们总会被糖画摊位深深吸引。站在摊位前，左瞧瞧，右瞧瞧，不难发现制作糖画的工具十分简单——炉火一盆，锅、勺子、小铲刀、竹签各一把，大理石板或钢板一面。糖画



平湖万州 与你“鸥”遇

史宗历 摄/视觉重庆

让英雄还原为真正的人

——观京剧《秦良玉》

传里的女将军——《明史》所载：“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取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或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远所惮。”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成功塑造真实的英雄形象，始终是当下戏剧人探索的重要课题。文艺理论家刘再复曾说过，“真正的英雄式的观念，是不屈服自己心灵之外的各种压力，敢于面对人，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值表现出来。”

重庆京剧院此次挖掘整理，为尚派第三代传人周利量身定制，不仅是对尚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为了尽显秦良玉这个英雄人物身上所特有家国情怀，极具现实意义。

秦良玉作为被讴歌者，在剧中并没被简单处理为干瘪的符号。当陷入为夫报仇与浴血杀敌的矛盾中时，她也迟疑困惑，也挣扎徘徊，最终选择舍小我救中华。剧中穿插了郑秉云与杜继新等朝廷重臣以权谋私、贪污谋国的事件作为对立冲突，也多角度地强化了秦良玉的爱国精神与报国情怀。

为了让人物原型升华为舞台上栩栩如生的戏剧形象，该剧在真实不虚与集中提炼之间努力找准平衡点，武有将军走边巡江，文有大段优美唱段，充分展现秦良玉为妻之柔美和为母之温情的一面。当这些复杂性和多面性被生动细腻刻画出来的时候，秦良玉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格外有血有肉，丰满鲜活，更接近真实的人，更接近真正的英雄。

此外，该剧的渝派特色相当浓厚，让人印象深刻。舞台设计简约大气，巴渝风格的水墨背景既有中国传统美学意义，又有一种重庆人精神气节和性格特征的现实隐喻。剧中除了反复出现佛图关、二郎山等重庆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音乐元素也无缝衔接至剧中音乐，突出了地域性，让人倍感亲切。

《秦良玉》的成功演出，充分体现了重庆戏剧界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过去，大多传统剧目传递的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善恶评判，但表现上流于平面化和概念化，缺乏理性思辨和对人本身的关照。重庆京剧院以《秦良玉》为范本，在保留京剧古典艺术魅力的基础上，将关注点伸向了人性和灵魂，赋予人物全新的时代意义，贴近当今审美需求，更容易让观众领略到京剧之美，也更容易让爱国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让英雄还原为真正的人，可以说是京剧《秦良玉》最大的成功之处。或许将它称之为经典还为时尚早，但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刻画，对英雄的塑造，以及对创作视角的把握等等，则是可以助推重庆戏剧走得更远的重要力量。